

张国雄
著

明清

时期的两湖移民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族谱、地方志对两湖移民研 究的文献价值	(4)
第三节 研究对象、方法	(9)
第二章 移民过程	(14)
第一节 迁入过程	(14)
第二节 迁出过程	(21)
第三节 小 结	(30)
第三章 移民的地理特征	(34)
第一节 分布：迁入两湖	(35)
第二节 分布：两湖内部移动	(45)
第三节 分布：两湖向外移民	(48)
第四节 迁出地：江西	(62)
第五节 迁出地：两湖	(67)
第六节 小 结	(74)
第四章 移民的动因、类型	(83)

第一节 动 因	(83)
第二节 类 型	(102)
第五章 移民的迁徙路线和信息传递	(118)
第一节 迁徙路线	(118)
第二节 信息传递	(124)
第六章 移民与人口	(134)
第一节 人口发展趋势	(134)
第二节 人口分布的变化	(153)
第三节 民族、华侨	(160)
第七章 移民与经济	(165)
第一节 两湖开发简述	(165)
第二节 “湖广熟，天下足”	(188)
第三节 商业移民的活动	(200)
第八章 移民与环境	(214)
第一节 森林资源的减少	(215)
第二节 河湖状况的改变	(217)
第三节 抗灾能力的下降	(220)
第九章 余论：对中国移民史的再认识	(237)
第一节 中国移民史的阶段划分	(237)
第二节 中国古代移民的几个特点	(252)

附 表

表 1-1 族谱版本统计	(6)
表 2-1 湖北家族迁移时间	(15)
表 2-2 湖北家族迁移时间 (宋)	(15)

表 2-3	湖北家族迁移时间 (元)	(15)
表 2-4	湖北家族迁移时间 (明)	(15)
表 2-5	湖北家族迁移时间 (清)	(15)
表 2-6	广济、黄安、通山、松滋四县 家族迁移时间	(19)
表 2-7	湖南家族迁移时间	(19)
表 2-8	明清时间新化等县游氏家族向 外省移民统计	(22)
表 2-9	两湖移民四川的过程	(23)
表 2-10	清代两湖籍移民入川统计	(26)
表 2-11	清代广东等省移民入川统计	(26)
表 2-12	湖北移民家族各时期的数量、 百分比	(30)
表 3-1	四川会馆统计	(58)
表 3-2	移民迁出地	(63)
表 3-3	迁出地的省区构成	(64)
表 3-4	两湖会馆的省区构成	(65)
表 3-5	江西迁出地	(66)
表 3-6	两湖迁出地	(68)
表 4-1	两湖民众避难洞崖	(88)
表 6-1	明代两湖部分州县户口变动	(136)
表 6-2	成化、正德、万历湖广户口变动	(150)

表 6-3	天宝年间两湖九府、州户口	(154)
表 6-4	崇宁年间两湖十四府、州户数	(155)
表 6-5	明清两湖各大区户口变化	(157)
表 6-6	万历、嘉庆两湖各大区人口密度	(159)
表 7-1	两湖外省籍移民始迁祖迁移年龄统计	(169)
表 7-2	湘南、湘中、鄂东南水利工程统计	(179)
表 7-3	明清两湖田地变动(亩)	(183)
表 7-4	明清两湖田赋(隆庆、乾隆)	(185)
表 7-5	明清两湖各府州田亩百分比(隆庆、乾隆)	(186)
表 7-6	明清两湖各府州田赋百分比(隆庆、乾隆)	(187)
表 7-7	清代湖南常平仓谷数	(192)
表 7-8	清代湖北常平仓额谷数	(196)
表 7-9	湖南各区常平仓谷数	(199)
表 7-10	湖北各区常平仓额谷数	(199)
表 8-1	江汉-洞庭平原水灾基本情况	(222)
表 8-2	江汉-洞庭平原水灾结构	(226)

表 8-3	江汉-洞庭平原水灾周期 (年)	(226)
表 8-4	清代江汉-洞庭平原赈恤基本情况	(228)
表 8-5	江汉平原水灾与赈恤对照	(230)
表 8-6	洞庭平原水灾与赈恤对照	(231)

附 录

附录一	移民档案	(257)
附录二	湖北会馆统计	(287)
附录三	湖南会馆统计	(292)

附 图

图 1-1	两湖分区示意图	(296)
图 1-2	四川分区示意图	(297)
图 3-1	两湖内部区际间移民示意图	(298)
图 3-2	两湖向外移民示意图	(299)
图 3-3	江西等省移民两湖示意图	(300)
图 3-4	江西迁出地分布示意图	(301)
图 3-5	两湖迁出地分布示意图	(302)
图 5-1	迁入两湖路线示意图	(303)
图 5-2	迁出两湖路线示意图	(304)
图 7-1	两湖粮食外运区域示意图	(305)
图 7-2	两湖主要产粮区分布示意图	(306)
后 记		(30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现状

1983年，在石泉教授指导下，我开始为有关江汉平原历史农业地理的硕士学位论文收集资料。在这个平原的一些县、市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当地流传着“江西填湖广”的民谚，而且经常能够听到年长者或年青人对其祖先的来历，所讲述的内容大致相同的生动形象的故事：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先民们被反绑着双手，由官兵用船押送到了江汉平原。至今湖北人称上厕所为“解手”，即源于

这次迁徙途中先民要方便必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绳索的特殊经历。为了证明自己是江西人的后裔，当地人还常常脱去鞋子，指着小脚指说自己指甲多一块，这就是“江西种”的生理特征。上述见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由得想起自己出生地重庆流传的另一句民谚：“湖广填四川。”于是我对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往何而去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室内工作时，我抽时间首先去查阅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发现了谭其骧先生撰写的《湖南人由来考》（《方志月刊》第六卷第九期）一文。谭老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注意并研究了 this 课题，此文为开山力作。他主要依据五种地方志和一些文集里的民族资料，对湖南七个州县的移民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今湖南人的祖先十分之九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人，而江西又占其中的十分之九；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元明两代迁入的。自此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再无人涉足这个领域。

五十年代中期，赖家度先生出版了《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其中谈到明前期涌往郧阳地区的流民运动，因该书重在分析农民起义，也就没有对流民与移民的关系进行讨论。

到七十年代后期，这方面的研究才又慢慢展开。1980年胡昭曦先生出版了《张献忠屠蜀考——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一书。这是学术界第一次讨论“湖广填四川”问题。他主要对清初两湖移民四川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该书立意是为民间广泛流传的“张献忠屠蜀”之说翻案，自然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利用更多常见的资料对“湖广填四川”进行总体的深入的分析。

已有的研究工作，无法帮助我们对波澜壮阔的两湖移民运动

获得全面的认识。换言之，两湖移民运动还是一个极有理论和实践价值而又有待大大开拓的研究课题。

于是，我又把目光转向了古代官方文献，希望从中获得对两湖移民运动较直接的了解。结果也令人非常失望，这方面的记载太少了。比如，有关“江西填湖广”，除地方志以外的官方典籍竟然只有两条资料，一是《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年间迁江西民到湖南常德等县事；一是《明经世文编》中邱浚的《江右民迁荆湖议》一文。我由此明白了这个重要课题为什么自谭其骧先生三十年代开题以后长时期发展极其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官方文献记载的贫乏和前人研究成果的稀少，不仅没有削弱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后来的社会调查中，开辟了新的资料源并不断获得回报，更使我充满了研究两湖移民运动的信心。

室内工作的不理想，使我把注意力转向了野外。既然传说至今还在流传，就不可能不存在物证。果然，在江汉平原一些县、市，我陆续看到了二十多部族谱以及墓志铭等其它实物资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硕士毕业以后，在研究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石泉先生一直支持我不断去野外调查，范围也由江汉平原到了其它地区。几年的努力，收获甚丰，为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为名的这场移民运动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1987年李世平先生出版了《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版）一书，其第六章中有两小节谈到两湖移民四川的问题，主要讨论了元末明初和清前期大规模移民入川的政策、原因以及对四川人口增长的影响，一些观点有待商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曹树基先生发表的《湖南人

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1990年)一文。他依据更广泛的资料,分区考察了外省移民湖南的时间、原籍、数量。问题讨论之深入,方法之科学,堪称谭文的姊妹篇。

同时,我也注意到,对于一个整体的两湖移民运动来说,已有的研究在区域上多是局部的,湖北还是一个空白区,两湖向外省移民其去向也不仅是四川一省;在内容上还有待拓展,如移民的过程、路线、动因、类型、地理特征以及移民对两湖人口、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都是应该而且有可能展开讨论的。还有,人们至今还没有从中国移民史的角度,去确定两湖移民运动的地位(这一工作极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移民史的总体把握)。因此,多方面深入研究“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还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便由此确定下来。

第二节 族谱、地方志对两湖移民研究的文献价值

本书在研究中,利用了五个方面的资料。①族谱。②地方志。③官方典籍,如正史、实录等。④遗物。在野外调查中所见的碑刻等实物,对认识局部地区的移民情况,多有帮助。⑤口碑传说和生活习俗。将这些素材与其它可信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运用,它们就能表达出重要的移民信息。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我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及运用过程中,深感顾老此言殊为确论。

从1983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先后到湖北的石首、江陵、沙市、监利、公安、松滋、枝江、洪湖、仙桃、竟陵、潜江、钟祥、荆门、嘉鱼、武汉、汉川、汉阳、随州、枣阳、襄樊、南漳、谷城、保康、房县、竹山、竹溪、郧县、老河口、丹江口、十堰、广水、麻城、红安、大悟、黄陂、新洲、黄冈、蕲春、浠水、武穴、蒲圻、安陆、京山、云梦、孝感、应城等46个县、市（湖北共83个县、市）进行了族谱收集工作。其中的甘苦，体味至深。湖北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历经解放初期的反“宗派”〔雄案：指宗族势力〕、六十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以及自然灾害（如平原湖区的水灾），使民间收藏的族谱几经劫难，大部分已毁失无存。只有很小一部分被家族观念强、胆子大的人冒险隐藏或堆在县、市档案馆、图书馆仓库中，才保存下来。因此，私人拥有者极其珍视而又心有余悸。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根据一个线索赶十几里几十里跑到私人收藏者家后，主人矢口否认，我虽明知其有，也只能败兴而归。只有在同族长者或熟人的带领下，查阅才比较顺利。在各县、市的收获也很不平衡。有的县、市是一无所获（并不是民间没有），而有的县、市又较为可观。在湖北期间，共查阅了三百部湖北族谱，七部湖南族谱。1993年，我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又先后在北京大学、社科院历史所、南开大学、科学院图书馆查看了一百多部族谱，使有关两湖移民的族谱积累到472部（反映迁入湖北移民的327部，迁入湖南移民的145部）。

这472部族谱，最早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版的《黄氏溯源录》，最晚为1963年版的《甘氏族谱》和《查氏族谱》，绝大部分为清后期和民国版（表1-1）。从版本情况看，除极少数为抄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外，其余均为普通线装刊本。

表 1-1 族谱版本统计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民国	解放后	不明	合计
湖北	1	1		1	4	3	5	37	6	213	3	53	327
湖南			6	5	11	14	13	35	6	55			145

资料来源：移民档案。

注：本书表格中无资料出处者，均为“移民档案”。

在历史人口地理方面，族谱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始迁祖姓名、迁移时间、迁出地、迁入地、家族世代人口变化、生卒年月、婚姻子女状况等等，是各族谱的基本内容。有一小部分族谱，不仅记载了本族的情况，而且在卷首还保留了其它家族的一些信息。异姓家族一般是在赠序中，为表示两族情谊之渊远流长，而回顾到自己始迁祖与受序家族始迁祖何时从何地迁来的情形。如光绪三十四年湘潭《钱氏族谱》、民国九年竹溪《尹氏二修族谱》即属此例。或为襄誉受序家族在当地如何势隆，而在赠序中记下自己始迁祖何时从何地迁入时所见之情形。如景陵市《景陵沿湖何氏宗谱》。同姓家族，大多是在正本清源，防止他族攀附的思想指导下，修谱时或“派人四出，或邮书访查”^①，将所得结果登录备案，以为后人参考，有助于家族管理，从而得到了反映。如民国三十七年嘉鱼《簪洲汪氏宗谱》、光绪十四年湘乡《扶塘杨氏续修族谱》。民国三十八年新化《游氏六修族谱》独兼这两种情况，它不仅列有“本姓各族调查表”，而且还设置了“新化各大姓由赣迁来史迹”一表。根据族谱资料，对本县 25 姓 36 个家族的迁徙源流作了反映，是一部资料价值很高的族谱。这样，472 部族谱所反映的移民单位就超过了族谱数（也有一族数谱情况存在）。

族谱资料中存录的一部分信息的虚假，是显而易见的。单部

族谱只记录了一族一地的情况，它自身无法表现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移民的基本特征。族谱还都有一个光宗耀祖抬高本族声望的毛病。在家族溯源时，往往以历史上一同姓名人为宗。这样就出现了很多同姓族谱的祖宗为一个人的怪现象。历史根本不可能如此地发展。另外，族谱对其始迁祖的身份也不无溢美之嫌。这在政治移民中最容易出现。所以，谭其骧先生说：“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②。此外，其他的内容，如始迁祖姓名、迁出地、迁移时间、迁入地等情况则比较可信。因为族谱是一个家族为了加强对族人的管理，适应家族发展壮大的需要，而对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血缘关系和世系所作的记录。修谱之时虽距其始迁祖已时远代迁，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各族往往将其前人的业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精神活动内容，通过口碑或文字代代相传，从而成为了修谱的重要资料。例如，湖南湘潭傅氏，其始迁祖傅澄于后唐同光二年（924）自江西南昌府迁入湖南巴陵。其后裔傅诚又于景泰初年迁入湘潭。傅诚之子傅万红在弘治元年（1488）74岁高龄时，嘱人笔录了他对前人经历的回忆，“以垂训”子孙^③。傅万红对入湘始祖的回忆，必有所据，或来自口碑，或阅自文献。这份笔录后来就成了该族在康熙年间创修族谱的原始依据之一。家族的口碑和文字资料除可能存在前述问题之外，其它内容则基本上可视为信史。

具体就这四百多部族谱对两湖移民研究来说，其文献价值至少可以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弥补了正史记载之阙佚。本书所分析的两湖移民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这可能是正史记载十分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族谱把这一具有明确目的、动因，在迁入地长久定居这样一些共同特

征的移民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至于因为正史的疏漏而忽视它的存在，或长期无法揭开它的面纱。族谱因此成为研究这场移民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2. 弥补了官方文献记载之不足。地方志等官方文献的有关记载，大多是一些抽象而概括的内容，很难从中了解移民决策心态、信息传递、动因、迁移经过、始迁祖所见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状况等。而族谱恰恰与之相反，记载的内容一般都很具体而生动，使我们多侧面的考察成为可能。

3. 族谱还是十分宝贵的古代人口数据库。世系表作为族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详细记录了该族成员的世系、生卒年月、婚姻子女状况，这些都是研究古代人口问题非常珍贵的数据。统计始迁祖的年龄，对了解移民的年龄构成，分析其行为特征，很有帮助。

地方志是官方文献中保存两湖移民信息最多的文献。我先后在武汉大学、湖北省、北京大学、重庆市、科学院五个图书馆查阅了湖北、湖南、四川的绝大部分方志，以及部分江西、安徽、江苏、贵州、陕西、云南、广西方志，约近六百部。从总体上讲，湖北方志中的移民资料远不如湖南、四川方志丰富。移民资料主要保存在地方志的“风俗”、“户口”栏目及艺文志的序文碑铭中。有的地方志专列有“氏族录”、“氏族表”，可供我们进行数量分析。

地方志的记载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多为第二手资料，尤其“氏族表”更是如此。方志的移民资料主要来自族谱和采访册，对族谱的取舍、运用，深受修纂者学识的影响，注入了他们的主观意识。因此，我们不能把地方志中的移民记载完全当作第一手资料来对待，对它提供的信息，必须有所分析。比如，很多四川地方志把来自两湖的移民都说成是出自“麻城孝感乡”，这完全是民间错误认识不加分析的翻版。麻城作为湖北一个山区县根本不可

能输出影响四川人口发展那样多的移民，从情理上地方志的这些记载就说不通。二是地方志反映的家族侧重社会上层，“大多以姓显族众为本，大姓必以科甲仕宦人丁为衡”。^④乾隆《广济县志》“土族表”就是一例。这势必影响地方志资料的代表性，在运用时应尽可能结合其他资料进行分析。

仅管如此，地方志移民资料的文献价值也是很大的。

1. 同样可弥补正史记载之阙。江西大量移民两湖的情况，在《明史》、《清史》、两朝《实录》等典籍中严重漏载，地方志却储存了大量信息，因此是研究两湖移民不可或缺的重要官方文献。

2. 族谱的记载范围以一族所居为限，而地方志一般以县，最小是乡为给定区域，虽有侧重社会上层之不足，但毕竟反映了一级行政区内的基本情况，它克服了族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缺憾。将其所反映的移民来源、时间、比例等总体情况与族谱记载结合起来分析，可获取相得益彰之效。

第三节 研究对象、方法

在本书选定的研究时段内，进出湖北、湖南的人口有多种情况，有的具有人口迁移的特征，有的则没有。因为他们移动的原因、目的，离开原居地时间的长短等方面都不相同，所以有的可称为“移民”，有的就只能算“流动人口”。作这种区分是很有必要的。流动人口以临时性的旅游、经商、仕宦及其他经济、社会活动为目的，对其原居地只是暂时离开。这类人口与长久性改变居住地的移民显然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明清两朝后期，江汉、洞

庭平原由于水灾的严重，经常有人口外流出省。其目的是暂借外地的经济条件渡过难关，填饱肚子。灾民在外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家中粮量的储量，因各年揭不开锅的日子多少不同，在外乞讨也就时长时短。一到农忙季节，绝大部分都会返回家园，他们把生存的希望仍主要寄托在故乡的土地上。每次向外流动的灾民规模还有大小之别。因受灾范围历年不同，灾民可能来自一个县，也可能来自几个县，还可能来自本区各个县。其流动的方向也受外界条件变化的制约，某地去年适合去打工讨饭，今年很可能同样遭灾而嗷嗷待哺，灾民就只有另择去处。这样，各年流动的路程长短也就有了差别。流动人口的非稳定性无法反映人口移动的规律和主要特征，而移民恰恰在迁移时间、距离、方向、规模等方面具有稳定性。换言之，在一定时期内，移民持续不断地从几个比较集中的原居地（迁出地）迁往目的地（迁入地），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迁移流。在古代纷繁复杂的人口移动中，只有移民能够反映一定的规律。那么，什么是“移民”呢？我非常赞同葛剑雄先生对“移民”所作的界定，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⑤本书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一种移动人口。同时，笔者还注意到几种流动人口如商人、官吏、卫所将士以及明前期的流民与移民的一定联系。有些人口的暂时性流动往往是长久性迁移的前奏，因此本书对这几类流动人口也有所涉及。

在对移民的规模进行估计时，本书选以“家族”为单位，而不是“人口数”。这样做，是基于如下考虑。移民概念包含原始移民和移民后裔两个含义，他们反映了不同的移民问题。古代文献中只有族谱可以帮助我们把他们区分开来，地方志的氏族志是以族为单位。但是，区分、统计族谱中的原始移民和移民后裔，不

借助计算机等现代手段，纯用手工，其难度是不可想象的。根据我收集和整理资料时所具有的条件，比较多的工作放在了原始移民方面。在工作中我又感到单纯以原始移民为统计单位也有不妥。原始移民有单身、有多人等情况，目前族谱所见大部分为单身，这里面肯定对父子、兄弟、夫妻同迁的情况有遗漏。也就是说族谱反映的原始移民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而且，本书是讨论现代两湖人从何而来，又去了什么地方，完全不考虑移民后裔这个因素也不现实。于是选择了“家族”这个概念。“家族”虽然在数量上比较模糊，但是从本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看，它可以表达原始移民和移民后裔所具有的移民含义。任何家族都有其始祖，族谱所载始迁祖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的符号。同时家族又是一个复数，代表一定的量，它本身就含有一族人口发展的意义。因此以“家族”为统计单位是可行的，这样还有利于与地方志的记载单位统一起来。

本书所称的“两湖移民”包含迁入和迁出湖北、湖南这两种情况。因此讨论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两湖，扩展到了除西藏以外的长江流域上中下游，以及黄河、珠江流域部分省区。这样，两湖移民运动所表现的规律和特点，就不仅仅属于两湖，而带有全局性的意义。

两湖移民的迁入和迁出过程，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其滥觞则可分别追溯到唐和元代。这在族谱和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为了获得对两湖移民运动的总体认识，在集中分析明清时期的同时，适当上溯其源头是必要的。书中有关各地区的家族比例是指民国时期的状况，因为族谱和地方志主要为晚清和民国所修，它们不仅反映了各家族的来源，而且还彰现了修纂时当地的家族现状，此其一。其二，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后相比，较少受到现代人口